

均势理论与中国外交

——第三届北京市国际关系专业研究生学术论坛综述

戴颖 赵通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北京 100084)

中图分类号: D80-27

文献标识码: D

文章编号: 1003-3386(2007)01-0109-03

均势理论是国际政治理论中的重要理论,对现代国家的外交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那么,他们采取均势政策的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有哪些?经典均势理论在二战之后继续发展,在现有的国际环境下,均势理论是否还能解释中国的外交现象呢?为此,2006年12月2日,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召开了“均势理论与中国外交”第三届北京市国际关系专业研究生学术论坛。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外交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芝加哥大学以及北京地区其他高校国际关系专业的学者和研究生应邀参加了此次论坛。本次学术论坛的三大主题是“经典均势理论与实践”、“均势理论新发展”和“均势理论与中国外交”,与会师生就这三个主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

一、经典均势理论与实践

均势理论是一个古老的理论,那么在历史上,国家是如何利用均势理论指导外交实践?针对这个问题,与会者对经典均势理论与实践进行了梳理和探讨。北京大学的孙立舟从大国的角度分析了传统均势理论,他回顾了19世纪英国的均势实践,总结英国成为一个成功“平衡手”的原因以及失败的诱因。孙立舟认为英国能够成功实施均势政策主要有四个原因:一是英国得天独厚的岛国位置便于其成为列强之间的调停人;二是英国的工业实力和海军力量在19世纪90年代以前都领先于欧洲其他强国;三是英国经验主义的哲学传统促进了实用主义外交风格的形成;四是英国的国内政治体制有利于长期执行均势政策。孙立舟把英国最终丧失“平衡手”地位的最根本原因归结为英国经济在19世纪末

以后增长速度相对落后,逐渐丧失了实施均势政策应当具备的实力。对此,中国人民大学的时殷弘教授强调,只有对国际关系史进行精细的研究才能促成理论上的进步,太过一般的分析无助于学术的发展。时教授指出,19世纪的英国并没有持续实施均势战略,而是经历了倡导均势、维持均势、放弃均势和重新实施均势四个阶段,对于不同阶段的均势政策应该进行进一步的研究。清华大学的李彬教授指出,均势政策不是必然和经常出现的战略,因此,分析大国会在什么样的条件下采取均势政策应该成为目前研究的重点。

清华大学的许辉从小国的角度总结了冷战时期越南均势实践的经验,指出小国也可以在国际社会传统均势背景下有所作为。从有利到不利,许辉把中小国家在大国均势中的作用进行了排序:制衡者、中立国、依附国、成为缓冲区和被瓜分。他考察了在冷战不同时期越南的均势政策,指出小国可在以上多种选择中求得有利位置。时教授善意地指出许辉在使用史实方面的一些不足,同时认为可以从越南国内政治分析其战略目标,从大国因素考察越南实行均势政策的国际环境。李彬教授认为需要充分研究小国采取制衡战略的理由。他提出,越南为什么不依附强国而采取投靠两个强国中较弱的一方以维持均势,需要深入研究小国采取均势政策的条件。

美国芝加哥大学的Todd Hall分析了汉斯·摩根索的均势理论中有关“道德公认”的思想,认为欧洲的“权力制衡”不是一个自然的结果,而是一种有历史因素的现象。摩根索认为欧洲的“权力制衡”以一种“道德公认”为基础,但同时,他又认为

政治家常假“均势”之名来谋求自己的利益,实际上追逐的是强权。对于这个似乎自相矛盾的思想,Todd Hall提出了可供解释的三个假设:一是“道德公认”是一种历史上的概念,这种概念影响欧洲政治家对国家安全基本条件的看法;二是“道德公认”可以构成一种抑制欧洲政治家的游说办法。政治家固然追求自己的利益,但是如果想得到其他国家的应允和支持,他们的个体行为就不仅是为了得到私利或者增强自己的权力;三是“道德公认”是一种共同信念的体系。在“道德公认”的框架下存在一种潜规则,因此欧洲的政治家能够协商何种行为是被允许的,何时需要一起合作惩罚所谓的背叛。对于Todd Hall的观点,李彬教授提出了“道德公认”适用效力的问题。李老师说欧洲国家采取均势政策是由欧洲局势决定的,如果在其他地区,虽然同是欧洲国家,但未必会同样采取均势政策。

二、均势理论新发展

围绕着均势理论的新发展,中国社科院的杨少华介绍了软制衡论的背景及实质。在权力极端不平衡的情况下,国际社会中原本就存在“集体行动的困境”将变得更加突出,制衡霸权国的均势联盟也将无法产生。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应对办法就是“软制衡”。它可以被理解为“硬制衡”的预备阶段,并有可能成为实现均势的准备阶段。杨少华认为,在“软制衡论”方面,佩普创造性地对“制衡”概念的内涵进行了拓展——“制衡”不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主要是军事意义上的“硬制衡”,同时也涵盖了主要以非军事形式进行的“软制衡”。杨少华也同时指出,“软制衡论”把“软制衡”视为“硬制衡”的预备阶段,其最终着眼点仍然是大国间权力(这里指的是传统意义上的硬权力)的制衡与对抗,其本质上仍然属于现实主义的理论范畴。并且,“软制衡论”实际上混淆了当代权力、制度、观念等不同互动层面的特点和区别,从而容易使许多原本正常的国际妥协与磨合现象统统笼罩上战略抗衡的色彩,进而导致理论的短视和政策的失误。对此,人民大学的时殷弘教授指出,佩普在“软制衡论”中给出的是较狭窄的定义,主要针对的是美国的“软制衡”。“硬制衡”的成本太高,而“软制衡”的效能更好,并且“软制衡”并不完全属于现实主义范畴,在自由主义与建构主义中也有软制衡,只是

没有用这个名词。

清华大学的徐进指出,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却是一个相当善意、温和的霸权国,并不对国际体系具有破坏性的威胁。面对这样一个霸权国,其他大国是否应该制衡、如何制衡就成为一个问题,因此提出了软制衡。徐进认为,软制衡可以视为制衡,更聪明的软制衡手段可能是利用国际规范。这是由于国际规范具有合法性和具有强烈的价值判断和道德指向的特点。相对传统的制衡手段而言,利用国际规范来限制霸权国或霸权觊觎国的行为,可以在短期内达到传统均势政策的效果。对于今后均势状态能否出现的问题,徐进认为这主要取决于如何定义均势,如果均势被定义为达到抑制霸权国或霸权觊觎国对国际体系所造成的威胁的状态,这种均势就是可以实现的,手段就是充分利用国际规范的制约作用。对此,清华大学阎学通教授指出,研究均势,应该注重研究如何判断国家实力的大小、国家间实力对比的平衡与否;实力与权力间的相关程度如何;一个国家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存在打破平衡的意愿等。同时,阎学通教授认为,制衡是一种短期行为,与规范无关,并不能把规范理解为制衡方式。

从复杂系统效应的角度,外交学院的刘慧解释了为什么古代中国与近代欧洲早期有着类似的国际政治过程,但最终结果却完全不同。由于正反馈和负反馈的存在,权力分配的微小差异通过路径依赖而不断扩大和加强,偶然的突发事件因此呈现了不同的发展结果。刘慧进一步指出,杰维斯只是用事实验证了系统效应的存在,而没有以建立理论模型的方式阐明产生系统效应的动力机制,难免陷入传统的因果论思维模式。因此如何克服这种悖论,显示偶然的事件在随机进程中怎样不断积累,从而从众多的可能性中选择出其中一个平衡点,是目前用系统效应来分析国际政治所面临的挑战。

三、均势理论与中国外交

均势理论可以为中国新时期的外交政策提供哪些启示和借鉴?同学和老师针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外交学院的林民旺提出俾斯麦外交对中国外交战略具有启示意义,讨论了在单极世界下中国的过渡战略。他指出,俾斯麦实施同盟体系战略的国际环境、战略设计和意图与中国目前状况有很

多相似之处,认为中国未来最合适的战略选择应该是“克制+参与”。具体的操作方法就是“编蜘蛛网”,通过建立不敌对、不对抗的伙伴关系将中国置于大国关系的中央,使中国来拉动整个体系的运作,而不能像同盟那样,承担过高的责任与义务。对此,北京大学的贾庆国教授指出要重视研究的创新性。他认为中国外交政策一直遵循“克制与参与”的原则,应该重点研究俾斯麦的外交对中国外交实践有什么新的借鉴经验。清华大学的阎学通教授强调,中国原有的战略是通过韬光养晦求得强大,在中国实力不断增长的情况下,中国外交是否保持“克制”应当取决于对中国实力地位的判断。阎老师认为维持和平确实需要织一个网以牵制各方利益,但在中国和平崛起的过程中,和平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尤其是当中美出现结构性矛盾,美国无法容忍中国成为与其一样强大的国家时,“编蜘蛛网”的方式是否还能使中国通过和平方式实现崛起?

中国人民大学的熊李力认为随着实力的迅速增长,中国外交应该采取“超越均势”的政策。为了避免遭遇地区均势体系的制衡,中国的外交政策要使亚太地区摆脱均势思维的影响。熊李力认为实现超越均势的目标,观念因素的作用极为重要。这种观念因素可以分为两个层次:单位层次的“塑造现状维持者的自身形象”和体系层次的“打造足以为其他国家带来心理保障的地区制度文化”。同时,应加强与地区内各国的复合相互依赖,为超越均势提供物质支持。阎老师肯定了单极与均势可以共存的判断,但他认为能否超越均势的关键在于美国的战略选择,在于亚太地区国家间的平衡是否会影响美国的核心利益。阎教授还指出国家身份如何形成这个问题,是来源于自我的界定还是他国的认可?如果

这个问题分析不清,观念因素难以实现超越均势的目标。

中国社科院的薛力提出了在朝鲜问题上,中国超越均势的解决方案。他认为目前的朝鲜问题处于一个失败的均势,中国应当调整半岛战略,形成一种以建构主义为基础、结合新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朝鲜问题战略”。贾教授认为朝鲜问题的复杂性使中国政府难以形成一个理想的解决之道,中国政策的关键应该在于阻止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决心和有关政策力度的讨论。

清华大学的齐皓认为,中国外交政策的首要任务是应对美国及其他国家的猜忌,防止制衡行为。他认为中国当前所采取的区域化政策具有以“非传统安全”为主的新特点,指出传统均势理论与当前中国外交政策的不符之处,认为观念的变化导致了中国区域化政策的变化。对此,贾教授指出中国采取的区域化政策有以“非传统安全”为主,也有以“传统安全”为主,如上合组织,因此,应该进一步关注政策的表面不同与实质区别之间的关系。阎老师认为齐皓对于中国目前区域化政策的描述准确,但问题在于中国对自己身份的认识不明,没有解决政策对谁负责的问题,认为中国偏好的变化是由外交目标的变化导致而不是战略的变化。

在本次学术论坛上,与会研究生在发言中展示了较高的学术水准,讨论气氛热烈,让在座老师非常欣喜。点评教授在充分肯定的同时,也指出同学们在史实运用、理论思考和政策分析上的不足,希望同学们能在今后的专业学习和研究中更上一层楼。

(责任编辑 吴文成)